

学习与参考

目 录

党政之声

- 全面深化改革从凝聚民心处发力 (2)
吹响关键期国家安全工作“集结号” 陈向阳 (3)

理论之光

- 2013十大思潮 (二) (6)

党的建设

- 以“国之魂”引领“国之制”不断完善 赵周贤 (8)
中共执政的三大“本钱” 牛先锋 (10)
中国成功的五个原因 张维为 (11)

时事热点

- 解决当今世界六大重要问题都可从中国取经
..... 艾伦·麦克法兰 (12)
让垃圾分类投放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3)
别仇官，体谅官之苦 公方彬 (14)

名词解释

- “精神赡养”，“道德黑客”等5条 (16)

全面深化改革从凝聚民心处发力

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幕会上，在李克强总理履新以来的首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开局之年全面深化改革，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作出了思路清晰、重点突出的说明，展示了全面深化改革将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首要发力点的顶层设计。

2014年被外界誉为全面深化改革元年，而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提升经济内生动力，能为其他领域的改革提供基础、保障与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体制改革顺利与否关系到其他领域改革的成败。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到2020年，要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在六大方面共计14项主要改革任务和重大举措中，经济方面就占了6条，涉及基本经济制度、现代市场体系、政府职能转变、财税体制改革、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以及开放性经济体制等项。这些改革中的任何一个领域都意义重大而又牵涉广泛，以何种方式与节奏推进诸多改革领域的落实，不为全面改革遗留短板与

空白，是对本届政府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

历来重大改革的推动，或遵循“先易后难”的道路，春风化雨、循序渐进、徐徐图之；或奉行“先难后易”的办法，雷霆手段、大刀阔斧、破而后立。

前者适于治久病，要求改革者有坚定持久的毅力，有分层析缕的智慧，而社会方面，亦有较为充分的容忍度，使改革者有足够的时间来积跬步以致千里；后一个办法则适于治疗急症，要求改革者有勇气，善决断，还得具备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号召力，同时所面临的社会矛盾突出而集中，只要解决这重大问题，即可续之以温补，与民休息。

现今中国之改革，已容不得改革者挑难捡易。单凭以上两种思路已不现实。所谓“当前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此其意也。时间紧、任务重，牵扯广、掣肘多，民众期待而焦虑，矛盾突出而交织。

从李克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的思路来看，改革者采取了超脱于前述两种方法之外的新思路，不以困难或容易为优先事项，而先以能凝聚民心、

调动群众的事作为改革的发力点，推进全面改革。“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以壮士断腕的决心、背水一战的气概，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一句话，群众疾痛之所在，虽难必除。

首先，将简政放权等行政体制改革上升到政府自我革命的高度，以此取信于民。“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政府先作出并履行好关于自身行为规范的承诺，才能为经济改革的后续推进，提供稳定的预期。民众不担心改革的成果会因政府的行为失范而被侵夺，社会的资源才会更多也更放心地流向国内生产性领域。

其次，为民众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报告提出，在金融、石油、电力、铁路、电信、资源开发、公用事业等领域，向非国有资本推出一批投资项目；要清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的

各种关卡。这意味着政府将以实际行动打破横亘在民间资本与垄断领域之间的“透明天花板”，拆除部门利益垒砌的坚壁。

报告强调，更好地改善和履行政府职能，解决民众当下之急与后顾之忧。

民众之急有三，一是食品安全，二是环境安全，三是社会安全。民众之忧有三，一是壮有所用，二是老有所养，三是幼有所教。凡此种种，都与政府如何履行职能实现现代化的治理能力有关。

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不全在于治理手段、方式、设备、技术的现代化，而首先在于治理观念由“衙门”心态、“青天大老爷”心态、“父母官”心态向服务心态转变的现代化。惟有让各级官员学会为民众分忧，改革的社会基础才真正牢不可撼。

（摘自《东方瞭望》）

吹响关键期国家安全工作“集结号”

陈向阳

面对空前复杂的国家安全形势，唯有以全新的理念、全新的机制、全新的战略加以应对，方能争取主动避免被动

4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了中央

国安委第一次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国安委副主席李克强、张德江出席会议，

中央国安委常委、委员出席，中国的国家安全工作由此迈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其特征是兼顾中国特色与国际惯例、中央强有力统筹、跨部门整合、从战略上主动运筹。

中央国安委召开首次会议和正式启动，顺应了国内外形势、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环境的新变化。习近平强调成立国安委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要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保障，目的就是更好适应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建立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体制，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

当前国内国际形势错综复杂，民族复兴进入关键期，国家安全工作进入敏感期。就国内而言，新一轮改革大幕拉开，社会转型期矛盾容易诱发各类群体性事件，敌对势力趁机渗透颠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难度倍增。“东突”等民族分裂势力蠢蠢欲动，伺机制造暴恐破坏活动。极端天气、重大天灾、重大疫情频发，生态环境与公共安全形势严峻。

就国际而言，大国综合国力竞争水涨船高，围绕地缘、经济、软实力、“全球公地”（网络、海洋、太空、极地）等的战略博弈更趋激烈。周边安全环境尤为严峻，美国重点转向亚太，着力利用中国与一些邻国的海洋领土争端，着力扶持日本、菲律

宾等，大搞“以邻制华”、“以邻扰华”。日本顽固坚持右倾化，极力争当军事与政治大国，菲律宾更是“挟美自重”。与此同时，中国的海外利益加速拓展，安全风险与日俱增。

正是基于客观环境的日趋复杂，习近平讲话指出了当前我国国家安全的“三个历史性巨变”：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而面对空前复杂的国家安全形势，唯有以全新的理念、全新的机制、全新的战略加以应对，方能争取主动、避免被动。

习近平讲话内涵丰富，含金量极高，充满了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创新性，新意主要有二：

其一，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一观”）和“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一路”）。“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对既有的“大安全”与“综合安全”等的超越和发展，其内涵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一观”与“一路”是对新时期中国国家安全的最高概括，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的独特国情使然。看待中国的国家

安全工作体制机制，应切忌动辄以国外，尤其是西方大国的标准来衡量、评判、指点，而中央国安委既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也是道路自信与战略自觉的充分表现。

其二，贯彻唯物辩证法，强调统筹兼顾，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实乃国家安全工作的指南针，具体包括以下“五个‘既’和‘又’”：

一是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

二是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

三是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国家安

全体系至少包括这十一个领域，而将国家安全划分为不同的具体领域，不仅有助于确定安全威胁的来源，也有利于有的放矢地部署工作。

四是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卫国。

五是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

习近平讲话吹响了关键期中国国家安全工作的“集结号”，展望未来，一要在战略上“开拓进取”，抓紧谋划国家安全的总体及其部分战略，科学研判国家安全环境，合理排列安全威胁挑战的主次、轻重、缓急；二要在机制上“整合创新”，以中央国安委为“龙头”，统一指挥、统筹协调，增强包括情报工作在内的国家安全能力、合力、战斗力。

（摘自《人民论坛》）



编者按 201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年。围绕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党的建设等一些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理论界展开了讨论和争论，使得2013年思想舆论市场更加活跃、更多激荡。

《人民论坛》调查中心从关注度、活跃度与影响力三个主要指标监测调查2013年社会思潮的变化。调查结果显示，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民族主义、创新马克思主义、普世价值论、宪政思潮、民粹主义、新左派、新儒家、伪科学位列2013年度值得关注的前十大思潮。本刊分两期摘登相关观点，以飨读者。

2013十大思潮（二）

6、宪政思潮

现实表现：2013年，“宪政”、“宪法政治”成了新的敏感词汇，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了言论“禁区”。一股反改革、否定82宪法之风袭来，火药味十足，引起知识界理论界的惊诧和反弹，群起质疑、反驳。围绕着宪政是否特指“资产阶级宪政”话题，学术界展开了激烈的争鸣。

核心观点：宪政是以实行民主政治和法治为原则，以保障人权和公民的权利为目的，创制宪法（立宪）、实施宪法（行宪）、遵守宪法（守宪）、维护宪法（护宪）以及发展宪法（修宪）的全过程。简言之，宪政就是依宪执政和依宪治国。宪政又称宪治。宪政如同法治、民主、自由、人权、市场经济等制度、事物一样，本身并不存在着姓“资”姓“社”的问题。其姓“资”姓“社”取决于运

用这些制度的人赋予其什么内容。

新动向：关于宪政的争论中，有三种基于不同理论认知的宪政主张：第一种主张是坚定地走中国特色宪政之路，该主张所基于的是宪政的普遍适用性与中国国情特殊性相结合的理论认知；第二种主张是走与西方国家完全相同的宪政之路，该主张所基于的是西方宪政为唯一普适性宪政模式，宪政即西方宪政的理论认知；第三种主张是拒绝和反对任何宪政，继续走我们已经走过的权力高度集中的路，该主张所基于的是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姓“资”，是西方国家欺骗我们人民的“美丽谎言”和“话语陷阱”的理论认知。绝大多数学者和实务工作者是第一种主张的拥护者，即主张坚定地走中国特色宪政之路。

7、民粹主义

现实表现：2013年，著名经济学

家茅于軾因某些政策主张而遭民粹主义者痛恨，先生遭到围攻、辱骂，甚至肢体暴力；李某某案中，梦鸽为其子辩护，引起网友攻击谩骂，网民对公共事件的评议体现出仇官仇富情绪。

核心观点：民粹主义认为平民被社会中的精英所压制，而国家需要离开精英的控制。其具有极端平民化倾向，反对精英主义，忽视或者极端否定政治精英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新动向：在医学等专业性很强的领域，网民大规模越位，围剿专业人士，迫使许多专业人士噤声。三中全会后改革以及反腐的大动作，在不同程度上缓和了左右翼民粹主义者仇官心理。

8、新左派

现实表现：面对现代化进程中的贫富分化、社会不公等问题，“左”倾思潮通过一定程度上的“自我革新”后，又以新的面貌出现。其最重要的“新”是强调新时期社会分化中弱势群体的利益，有着浓厚的底层关怀，因此在底层民众、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草根网民中激起共鸣，形成相当大的影响力。而在债务危机持续和蔓延的欧洲，激进左翼十分活跃，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表现出复杂多变的特点。

核心观点：当今中国，“左”的思潮是以西方左翼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为基础，以平等与公平为核心价值，把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分层化、社会失范与社会问题理

解为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体现，并以平均主义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选择的社会思潮。

新动向：中国“新左派”思潮中有一种极端化的倾向，即否定改革开放的成就，希望终止市场化改革，回到1978年前的状态；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正面因素”和“积极作用”，希望用“文革”中的“大民主”方式解决当前我国存在的腐败、分配不公、贫富分化等问题。

欧洲激进左翼在谴责资本主义的弊端、尤其是声讨新自由主义政策方面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但在纲领政策方面却并没有提供一种能够被主流社会所认可的替代性纲领，因而它们在政治上的表现也乏善可陈。

9、新儒家

现实表现：在过去的一年中，儒家学者不约而同地围绕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举办了多场学术研讨会。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包括各社会学科的专家，重读《尚书》、《礼记》等儒家经典。

核心观点：新儒家泛指一切主要从儒家思想资源出发，同时吸收当代其他思想学说，来回应现实问题的思想倾向。新儒家坚信中国本土固有的儒家文化和人文思想存在永恒的价值，谋求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现代化。

新动向：对社会政治领域的关注，是新儒家的一个重要转向。虽然新儒家、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构成了当代学院派或民间派政治哲学的基本格局，但明显地，新儒家群体更倾向于

有条件地接纳自由主义而不是新左派。对于儒家文化的研究和阐发，过去主要是在人文学科中进行，现在则向社会科学进军。一批社会科学家从儒家文化的价值和义理出发，并结合社会科学的专业知识，从事特定领域的研究。

10、伪科学

现实表现：2013，“王林”是一个热词，从众多明星和官员争相拜访，到被媒体揭穿，又一个“伪大师”从云端跌落。与此同时，面对雾霾天气，“核污染”、“铀辐射”等耸人听闻的说法也在传播流传，一些“伪科学”的谣言不时出现，屡辟不止。

核心观点：伪科学是指把没有科

学依据的非科学理论或方法宣称为科学或者比科学还要科学的某种主张。它一般没有充分的经验内容，没有经过严格的科学实验的证实和社会实践的检验。多为幻想、猜想、假设、臆造和编造，而不是科学知识或科学真理。

新动向：“伪科学”的横行，源于“真科学”的“虚无缥缈”。2013年9月，101位院士对王林事件共同发表公开信，称“一些政府高官、著名企业家、文体明星等社会公众人物却深度参与其中，起到对伪科学推波助澜的作用”，并“倡导知识界人士率先提高科学素养，抵制低俗迷信，刻不容缓”。

（摘自《人民论坛》）

以“国之魂”引领“国之制”不断完善

赵周贤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把价值体系与国家治理体系联系起来论述，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我们要深刻把握国家治理体系与价值体系的内在联系，把二者更好地统筹起来，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的价值支撑。

国家治理体系与价值体系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核心价值体系代表一

个国家的“思想主权”，是“国之魂”；治理体系是国家机器有序运行的制度载体和保证，是“国之制”。“国之魂”对“国之制”具有引领和决定作用，有什么样的“国之魂”，就有什么样的“国之制”；“国之制”对“国之魂”具有承载、保证和弘扬作用，“国之魂”愈健，“国之制”就愈强。一个国家只有根据本国国情和历史传承来选择和坚持治理体系与价值体系，并使治理体系与价值体系高度一致、相互匹配、相得益彰，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

康。反之，如果治理体系与价值体系错位，就会出现颠覆性错误，甚至导致天下大乱。因此，必须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核心价值观贯通起来思考，统筹起来把握。

一方面，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引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是我们的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用以指导、规范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实现“国之制”与“国之魂”相统一，确保国家治理体系的价值取向与核心价值体系相一致，特别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国家治理中的指导地位，把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治国理政的根本。

所有价值观念都是具体的、历史的。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历来是资本利益的意识形态表达，以追求资本利益最大化为价值目标。西方资产阶级利用其主导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和国际话语权的有利地位，把西方自由、民主、人权说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标尺，说成人类文明发展的“唯一选项”，在世界上竭力推销他们的价值观念，对他们不喜欢的国家和政府进行渗透、破坏、颠覆活动，造成一些国家政局动荡甚至政权更迭。对西方国家宣扬的那套价值观念，我们必须

清醒认识，必须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铸强价值之基，构筑起抵御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制度屏障。我们要把党领导人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优秀价值理念进一步集成和升华起来，把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美德创造性地转化和发展起来，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占据价值体系的制高点，形成超越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和价值观的强大软实力。

另一方面，要用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来更好地承载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首先，国家治理体系的价值取向与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在精神价值必须相契合相适应，这样才能从制度上保证价值体系的确立和弘扬。否则，如果二者相矛盾，国家治理体系就会从制度层面与价值体系相冲突，民族的精神血脉就会被割断。其次，在国家治理体系的价值取向与核心价值体系相一致的基础上，还必须保证治理体系的科学性严密性。如果治理体系的设计不完备，存在漏洞和薄弱环节，不仅会销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有效性，也必然会削弱核心价值体系的凝聚力和引领力。因此，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还必须高度重视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仅走出了一条不同于

西方国家的成功发展道路，而且形成了一套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有效治理体系。事实证明，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总体上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相适应的。但也要看到，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还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有些具体制度体制机制还有弊端痼疾，还不健全不完善，有些甚至成为制约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制约核心价值体系彰显和弘扬的重要因素。我们要以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

化，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不断织密制度笼子、扎紧制度篱笆，为核心价值体系的确立和弘扬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同时，要不断校正治理体系的价值取向，发挥国家治理体系对核心价值体系的强化培塑功能，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更为坚实的制度保障。

（摘自《求是》）

中共执政的三大“本钱”

牛先锋

第一，中共为何能取得革命成功，执政地位何以能够不断巩固？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一条是能够从基本国情出发，准确抓住并且成功解决中国问题。执政党的最大“本钱”是解决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共在革命时期抓住了“民族独立”这个问题，在执政初期抓住了“建设”这个问题，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抓住了“发展”这个问题，不仅问题抓得准而且解决得有成效，这为中共执政积累了大量的“本钱”。正是抓住了发展这一当代中国的最大问题，中共才使执政地位稳如泰山。第二，中共在革命和执政过程中不断积累“本钱”的原因，首先是在理论上弄清了

党与群众的关系是鱼水关系，在思想认识上自觉地把党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统一起来。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代表好人民群众的利益，并且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增进人民群众的利益，维护好、实现好人民群众的利益，这是中共革命和执政的最大“本钱”。第三，中共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把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理想，但中共从不拘泥于教条，善于在实践中创新和超越。中共在改革开放以来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立巩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但无论道路、理论还是制度，都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本”，

富有中国特色。中共的指导思想并非简单罗列，而是体现了创新的历史轨迹，在实践中起到了统一思想、凝聚

共识的作用，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

（摘自《求是》）

中国成功的五个原因

张维为

第一，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西方的政党公开代表社会中部分群体的利益，为了当权，政党之间互相竞争。中国共产党遵循着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力求代表整个国家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应该被看做是一个“国家型政党”，也就是代表一个国家整体利益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内部在执政理念和工作能力方面都鼓励良性竞争，同时又高度重视实干精神和共识精神。今天的中国继承了古代贤能政治的传统，结合当代实际，广泛采用了“选拔加选举”的政治模式。这个制度虽然还可以进一步完善，但就现在这个水平，也可以和世界其他政治模式进行竞争。第二，实行新型民主集中制。中国的成功离不开国家决策过程的大幅改进，这个制度安排可被称为“新型民主集中制”。这个过程已经将决策的程序和责任制度化了。在中央政府做出重大决策的过程中，往往会向数以千计的智库、政府机构、高校、学者、专业人员征询意见，甚至会从微博等社交媒体的激烈讨论中吸取有用的建议。无疑，这样的决策过程具

有更大的合法性。第三，预期创造和需求创造。从广泛的咨询和磋商，到媒体和网络对许多公众关注议题的讨论，到重大决策的制定和最后公布，这个过程在中国已经基本上定期化和制度化了，这个定期化和制度化的决策过程往往能使公众产生对于发展的新预期，新预期又创造新的需求，而且往往是中、长期的需求。中国社会上上下下对五年规划等决策都高度关注。在过去30多年里，中国国民生产总值能维持9%以上的高速年增长率，离不开这种经常性的预期创造和需求创造。第四，发展管理。中国确实形成了自己的发展模式，其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发展管理”。中国的国民经济五年规划和每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乃至地方政府出台的许多发展规划，都是中国“发展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还拥有其他许多国家不具备的一些“工具”，如国家掌握的土地资源和战略资源、一大批表现不俗的大型国企等。它们给中国政府更大的宏观调控能力，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五，“民意”和“民心”。在过去30多年里，

中国执政者实行“民心治国”。这使中国得以进行中、长期的规划，甚至为下一代的发展进行规划，从而避免

像许多西方国家那样，最多只能规划一百天或者只能规划到下一次选战。

(摘自《求是》)

解决当今世界六大重要问题都可从中国取经

艾伦·麦克法兰

目前世界面对的六大重要问题，解决其中任何一个问题，中国都可提供大量的经验。第一是国际关系和战争。西方一直以来咄咄逼人，四处入侵，打来打去。中国则是一个和平的文明体，在过去的150年中，中国几乎没有攻击其他国家。西方必须向中国学习和平发展的意识。第二是生态和能源问题。西方生活在碳基能源建构的财富上，这是我们工业革命的原因，是不可持续的，我们必须找到非碳基、可持续的新能源，而中国有史以来主要是借助比如风能、水能、人力，并且已经处于生态和可循环能源研究的前沿。第三是人口问题。西方人还没有能力控制自己的人口和世界的人口，但是中国已经借助计划生育政策走出了伟大的一步。这是世界上惟一能够在一代人时间内掌控人口的文明，是多么超凡惊人的事情。第四是如何维系一个庞大的社群，尤其当现代社会里传统的凝聚力消失的时候。中国又一次让人印象深刻。在过去两三千年中，通过建构考试体系的儒家教育、一以贯之的中文以及对中华文明的认同，中国人一直和谐地团

结在一起。以一种和平的方式将如此大规模的人群维系在一起，这是目前全世界都需要寻找的方法。第五是政治统治方式。现在西方一直仰仗民主制度运行。西方民主是在英国发明出来的，那时我们仅有四五百万人，这个系统运作良好。但是，当有12亿、13亿人口时，一人一票的民主是否还可行，这要重新考量了。它在印度就未见效，印度现在非常腐败，充满宿仇和争斗。美国在许多方面也不是民主制度，它的总统有太多的权力和太少的监督，大部分人觉得政治事不关己，又有强大的利益游说集团，美式民主是民主的最低限度。西方民主未必放之四海而皆准，西方模式不是最终的形态。第六是世界的全球化和多元化。越来越多的文化体系正融合在一起。关于这个问题中国同样有很多经验可传授，因为2000多年来它处理过多次边疆少数民族问题，整体上说这些处理都谨慎且有效，既吸取了那些族群的文化传统，也很成功地把五十多个民族结为一体。

(摘自《求是》)

一些城市虽然在地方立法中规定了一些处罚条款，但如何有效实施缺乏相应的技术手段和配套的政策制度，从而使得处罚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失效的处罚制度又使得地方法律的尊严受到挑战与威胁，在“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下不利于立法目标的实现

让垃圾分类投放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作为一个长期但迫切需要解决的工作，垃圾分类早已在我国部分城市铺开。

自5月1日起，上海开始实施《上海市促进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这一方面可解决上海垃圾分类方面的地方立法问题，另一方面，在生活垃圾的具体类比上，也有了较大进步。

《办法》明确了生活垃圾分类标准和不同区域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容器设置要求，同时明确了垃圾分类基本标准包括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干垃圾等四类；规定住宅小区、单位办公生产场所以及公共场所等三类区域也将根据不同特点设置垃圾分类收集容器，并将通过建立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制度、明确垃圾分类减量促进措施等途径改变和规范垃圾收集行为，提高垃圾处理水平。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作为生活垃圾责任主体之一的居民，《办法》中只是模糊界定了其权责，规定“个

人未按照规定投放生活垃圾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垃圾分类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监管和基础设施等相关的软硬件也同时进行。反观我国的一些城市，虽然在垃圾分类领域作了不少尝试，但收效不太大。

溯其源头，在于我们的社会还没有养成自觉将垃圾分类的习惯，大部分居民缺乏垃圾分类的意识。曾有学者对此作过调查，发现约八成的居民平日扔垃圾时没有分类扔放意识，且对于垃圾桶分类标识关注度较低。

观念的变化，要从细致的措施入手，一步步推进。收费和罚款未必是唯一良方。

国外发达国家垃圾收费制度的实施经验表明，垃圾收费制度并不一定必然导致垃圾减量，之所以出台垃圾收费制度，根本目的还在于明确垃圾产生者的责任以及为垃圾收运处置提供部分经费。

经济激励或许是一个较为可行有效的办法。

实际上，纵观上海垃圾分类减量的历程，经济激励处于不断发展完善之中。最初的经济激励主要为驱动再生资源公司积极介入的垃圾收费制度与市场激励，2011年又凭借“百万家庭低碳行，垃圾分类我先行”政府实事工程，出台实施了面向居民的经济激励措施。

比如，小区保洁员的激励。在上海试点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减量中，小区保洁员发挥了重要作用。居民分类投放的比重约在20%~30%之间，进入小区垃圾箱房后，保洁员再二次分拣，将玻璃、旧衣服、湿垃圾分类投放。经过保洁员的分拣，小区垃圾的分拣率达到90%左右。

再比如，对居委会及“四大员”的补贴。垃圾分类试点小区的宣传、动员、培训与监管主要是由居委会负责具体实施的，居委会通过指导员、宣传员、分拣员和督导员完成相应的

工作。为此，给予“四大员”不同程度的补贴，等等。

但就目前的情况看，我们还有较大的改善空间。一是城市垃圾分类办法和措施多来源于政府，是自上而下推动的，由于公众参与力度不够，居民对垃圾问题的认识不足等，导致其责任感与介入的积极性不够。二是一些城市虽然在地方立法中规定了一些处罚条款，但如何有效实施缺乏相应的技术手段和配套的政策制度，从而使处罚激励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失效的处罚制度又使得地方法律的尊严受到挑战与威胁，在“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下不利于立法目标的实现。

要想从根本上推进城市生活垃圾的分类减量，还需要在立法的基础上，通过制度设计，明确垃圾分类减量的责任主体及其相适应的经济激励，通过法律强制与经济激励的交互作用，双轮驱动促减城市生活垃圾。

(摘自《东方瞭望》)

别仇官，体谅官之苦

公方彬

相对于西方官员，中国官员累身亦累心。所谓累身，在于中国官员比西方官员承担了更多更大的责任，这与政治制度和政府职能划分有关，同时与中国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有关。

西方政治制度与权力运行，奠基自由主义经济。既然是“小政府”，且受制于契约与分权制衡，政府就不需要承担太多经济和社会责任。中国政治制度突出为集权，且形成了“集

中力量办大事”的施政理念，由此政府承担了很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职能。西方的文化源头是古希腊文明、基督教文化和罗马法，这些都在强化人们的独立意识和各利益体遵循契约的关系，故而依赖性弱，独立精神强。中国作为农业经济社会，农业生产高度受制于自然，单个家庭力量无法抵御自然，故而形成了对家族和乡里的依赖，进而是对政府的依赖。中国的社会转型又加大了这种依赖，比如，过去许多事务通过乡规民约即可解决，社会转型后，旧的乡规民约被打破，新的社会运行规则尚未确立，结果就是一切事务都要求政府帮助解决，这也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很难真正完善的重要原因。

上述种种导致了中西差异。美国总统到戴维营休假，政府仍然正常运转，共和、民主两党顶起牛来，美国政府还可以关门。中国官员显然没有这么轻松，且不说国家领导人感叹“时间都去哪了”，就是一个市长、县长也难找到集中休假的时间。大多数官员都在“五加二，白加黑”地忙碌工作。

其实，中国官员更累的不是身，而是心。累在身有处讲，累在心无处诉。心累主要缘于文化传统、体制制度和价值观念。

文化传统方面，官本位导致官员承载了强大的社会和心理压力。中国传统文化虽让我们骄傲，但也沉积了大量腐朽因子，比如不鼓励甚至压制科技创造，导致中华文明发展迟缓就

是其一。再一个就是不良官场文化扭曲官员心理的同时，也扭曲了社会价值观，它让官员外表光鲜，但所谓光宗耀祖的同时，官员们也产生了无限的焦虑与痛苦，甚至形成双重人格。因为，当全部价值落于官位，也就异化了官位，即不求贡献于社会，只求不断升官，这实际成了套在官员头上的无形枷锁。今日中国，官员大军一直在膨胀，甚至出现了副局级县委书记、正部级副部长这样的怪胎，皆源于官本位。如此，怎能不累心？

在体制方面，因为中国官场历来潜规则重于显规则，这些易将官员引入痛苦的深渊。理论上讲，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中国共产党，应当形成一个优于封建时期的官场生态，但结果未能如愿。由于长时间依赖政治力量，或者说是信仰信念的力量，就有意无意放松了法规制度建设。西方与我们不同，他们更强调和遵循法规制度。

在价值观念与精神追求方面，由于政治信仰缺失与价值观紊乱，致使官员在功利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有数据表明，中国贪官95%以上牵扯到情色问题，其间既有人性的原因，同时缘于精神空虚，需要靠发泄来缓解精神压力。人需要精神和物质的平衡，精神弱化，物欲必增。一定程度上，官场开始比俗而非比雅。由于制度漏洞导致大量官员存有“原罪”，中央反腐风暴一劲吹，这些官员心理压力之重，可想而知。

别仇官，请体谅官之苦吧！

（摘自《人民论坛》）

名词解释

1、**精神赡养**：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老年人的赡养内容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一些老年人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同时也注重追求精神生活需要，而且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一条也规定了精神赡养的内容，因而目前出现不少精神赡养的诉讼案件。精神赡养一般指在家庭生活中赡养人理解、尊重、关心、体贴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在精神上给予其慰藉，使其愉悦开心。

2、**道德黑客**：随着互联网技术迅速发展和黑客泛滥后，在全世界兴起了一个新职业，他们专门模拟黑客攻击，帮助客户了解自己网络的弱点，并为客户提出改进建议，找到应对的方法，维护互联网安全。他们就是道德黑客。

3、**失眠城市**：这指随着城市工作节奏变快，睡眠质量下降成了一种

普遍的城市病。淘宝根据网友夜间购物情况发布的一份“失眠地图”显示，北上广深以及杭州位居国内“失眠城市”前五名。

4、**人脉午餐**：这指年轻人通过网络邀请目标就职单位的职员聚餐，就餐时可以互相学习“职场攻略”，交流行业信息，既能积攒人脉又有助于顺利就业，日渐成为很多年轻人跨行业交流的时髦方式。

5、**比特币**：一种被称为算法货币的新货币形态，以区别实物货币和法定货币。它由开源软件产生，将在2140年达到2100万个的总量，其间任何机构都不能操控其货币总量或制造通货膨胀。有人认为它会成为世界的统一货币单位；有人认为其泡沫严重，是短期热潮；由于无人管控、交易匿名，也有人将其当作洗黑钱的工具。